

我和我的祖国——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

# 重回马岭脚七号

——浦江农民胡小长亲历乡村变迁

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杨远航

国庆期间,马岭脚七号开始对外营业。胡小长约上我们,回了趟老家。这幢房子记录着他的青春,如今重装整修,成为民宿。

胡小长,45岁,浦江虞宅乡马岭脚村人。17年前,娶了城里姑娘后,他一直住在县城。马岭脚七号,是他的家,他父亲一手建造的房子。

“村子的样貌都变了。以前,乱七八糟的柴火堆在路两边。”拾级而上,胡小长立刻发现了不同。马岭脚村位于浦江与建德交界的马岭半山腰上,东边马岭脚是浦江,西边是建德。210省道没有修建之前,马岭脚村世代代藏匿于崇山峻岭之中。

1970年,胡家又一个孩子呱呱坠地,这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了。对于几代单传的胡家,喜忧参半。喜者,人丁兴旺;忧者,儿子娶亲的房子在哪里?“那时候,我爸、我娘和我们兄弟三个、还有我姐姐挤在两间祖传的老房子里。我很小的时候,总听我爸说要建新房子。”

新房终于在1976年动工,那时大哥已经入伍当兵。“那幢最高的房子,就是我家了。以前山上还有几间房子的,这些年没人住,都塌掉了。”胡小长的家,在半山腰上,沿路有70多幢空荡荡的黄泥土房。

气喘吁吁地爬到马岭脚七号,村委会主任张开富已经拿着钥匙在等我们了。他把钥匙给了胡小长,让他最后一次亲手打开自家的大门。

胡小长神情复杂,喜悦中有不



昔日的黄泥墙,现在挂满了马岭风光照。 徐贤飞 摄

舍:“当年分家时,我爸妈说二哥腿脚不便,叫我把新房子让给二哥结婚,我同意了。这房子应该不算我的,但这毕竟是我的家呀!”

这房子里,有太多的时代烙印。1976年,胡小长的父亲和他们兄弟俩花了足足一年时间,拉了近100辆拖拉机的沙石、黄泥土,花了500元钱,才夯好这座77平方米的土木结构房子。

那时,群山之中的马岭脚交通极不便,山民唯一的收入就是背着山上的木头下山卖。“你知道背100斤木头,卖多少钱吗?1.3元!我二哥为了背木头赚钱,20岁不到就摔坏了腿,现在也时时受病痛所累。”胡小长边推开大门边说道。

“哟!跟我原来的家完全不一样了!漂亮,太漂亮啦!”胡小长惊

叹道。“原来大门进去就是我娘的房间,她4年前离世的。父亲走了,我们也下山住了,她就把床从楼上搬到楼下来了。”眼前的房子,古色古香,仿古木板做了个精巧的门厅,左边的房间里,摆着一排红木沙发,墙壁上挂着山水画。

胡小长感叹着,转了个身,就蹲在沙发边上的一盆绿色植物旁,“这里原来摆着我们第一台水晶加工机。那是1986年的事了。”胡小长说,那台水晶加工机是他大哥从山东带回铁板焊接而成的,那年二哥到马岭脚西边的建德打工,学会了磨水晶的手艺。这台机器,也是村里、乡里的第一台水晶加工机器。

后来,水晶业发展快了,马岭脚交通不便,离开家进城的人越来越多,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。胡小长和

二哥一家也离开了老家。老房子里只住着老母亲,无人管理,渐渐败落。

2013年,210省道建成,马岭脚村人把新房都建到了公路的两旁。到去年,村里准备开发乡村旅游,发展老黄土房的民宿时,老村里只住了10户老人。

胡小长的家是村里最早修缮的两幢房子之一,节日期间对外试营业。国庆过后,这幢从胡小长二哥手中租赁了30年的老房子,已经对外正式营业。

胡小长拖着我们给他拍照留念,在一楼原来的厨房里,在二楼原来母亲的房间里,还有当年他与二哥同住的房间里。“当年的床就是隔窗相对;现在房间的梳妆台的位置,就放着我们的书桌,我和二哥轮流在那里写作业。”

公共服务工作站为社区“减压”

## 全能社工帮你忙

记者 许雅文 通讯员 叶慧芳 实习生 徐佳妮



上羊市街社区正谋划“全能责任社工”。

许雅文 摄

万元钱,可是居民区没有那么多钱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她绞尽了脑汁,去裁缝铺和修理店,上门帮助他们把营业执照办下来,让他们营业的同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。就这样,终于筹足了安装路灯的经费。

2001年,原袁井巷、金钗袋巷、大狮子巷、上羊市街四个居委会合并成上羊市街社区,从居民区改革为社区。社区职能扩大,劳动保障、

计划生育、城市管理等等每条线都需要有人管,“现在的社区就像一个针眼,每条线都要从这里穿过去。”

基层社区有三难:“婆婆”多,任务重,各种考核多。如今,上羊市街社区正在探索将社会事务从社区居委会剥离,交给新成立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处理,目的就是减轻社区压力,专心服务于群众。

沈雪鸿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上羊

市街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。最近,他正谋划着“全能责任社工”。

帮扶救助员秦婷是去年刚来社区工作的新人。中午12时,她气喘吁吁地从金狮苑小区跑回服务站,向同事请教。“以前,日常工作诸如发放老年卡等就忙不过来,即使我是网格员,也只是收集居民信息。现在,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,做一名全能责任社工,我得掌握很多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。”

全能责任社工,就是实行区块负责制,社工要有能力在自己负责的区块现场为居民解决问题,解决不了的带回来交给相应的专业社工。

公共服务工作站还将尝试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让专业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的职责,同时承担政府交办的事务性公共服务。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让社区居民能享受到专业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。”沈雪鸿说,只要有颗一心为居民服务的心,就能走得更远。

见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变迁

## 沈凤鸣的三张医师证

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朱立奇

是一辈子。”沈凤鸣回忆道。

“赤脚医生”是村民对“半农半医”卫生员的亲切称呼。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,农村医疗事业底子薄,农民就医条件差,“赤脚医生”解了燃眉之急。

在县级全科培训71天,又在妙西镇卫生院实习了45天,沈凤鸣用116天就拿下了赤脚医生证,开始回村坐诊。

“那时的乡村诊所,要什么没什么。简单的两间平房里连基本的医疗器械都很难配齐,有些药还得定期去镇上的卫生院拿。”沈凤鸣回忆起以前的就诊环境,连连叹气。

找沈凤鸣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多,她碰到的疑难杂症也越来越多,渐渐地,沈凤鸣感到知识不够用了。

1994年,37岁的沈凤鸣,高分考取乡村医生证,开始在自家屋里

开办了王村的“第二代诊所”。诊所里不仅床位多了,氧气瓶、血压仪等基本医疗器械也都慢慢地齐备了。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提升,但是碰上大病还是没有条件治愈。

尽管如此,村民们都愿意来沈凤鸣的小诊所。“一方面因为离城里远不方便,更重要的是农民看病都要自费,真是看不起啊。”提起那时的农村医疗,沈凤鸣依然有些感慨。当时她就期盼着,有一天农民能和城里人一样实现看病报销。

这个想法在2003年变成了现实。那一年,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(市)试点,浙江省被列为试点省份。从2005年开始,吴兴区整合乡村医疗资源,医疗服务逐渐完善。到2006年,全省有87个县(市、区)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,提前两年实现目标。

农村人看病不仅能报销了,也

更方便了。

与医疗体制改革一起产生的,还有“乡村医生执业证书”。2004年,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颁布后,已经过半百的沈凤鸣,经过几个月的复习,第三次走入职业生涯的考场,拿到了第三张证书。

指着村口的那幢二层小楼,沈凤鸣说:“这就是我们王村社区卫生服务站,上下两层的。我们的队伍也壮大了,现在一共有5个人:3个医生,1个药师,1个护士。”

走进卫生服务站,药房、病房、诊疗室、档案室、值班室、会议室一应俱全。

现在新农合能报销了,村民们生活条件也好了,大家开始注重养生了,我们的任务转移到村民保健上来。即将开始就要对全村村民体检,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都要体检,由政府买单。”沈凤鸣说。

平湖“老鼎丰”掌门人姜炜——

## 辛勤酿造新生活

见习记者 江帆 市委报道组 任迎春

“春准备,夏造酱,秋翻晒,冬成酱”,这是流传于酱油酿造老师傅之间的顺口溜。这个顺口溜,平湖老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的姜炜25岁那年就知道。那一年他刚进“老鼎丰”,而如今的他已经65岁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陪着百年老字号“老鼎丰”一起几经蜕变。

1950年,姜炜出生平湖市城关镇。从记事起,姜炜就知道家乡有家酱园叫“老鼎丰”,是清朝同治年间就传下来的老字号。

念到初中三年级,姜炜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去了农村锻炼。后来知青返乡,姜炜被分配到老鼎丰酿造厂,在米醋车间做工人。酿造厂前身就是“老鼎丰”酱园,能来到这家“有历史”的酿造厂工作,姜炜说不出的兴奋。

那时候车间里都是纯手工作业,姜炜跟着老师傅一起蒸饭、拌料,学习各种酿造技艺。当时的厂房还是木结构的老房子,夏天米醋车间一蒸饭,工人们天天都要出上几身汗。“那时候年轻,不知道什么叫做苦,愿意干,就怕没活干!”姜炜回忆起年轻的时候,仍然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当年踌躇满志的影子。

1981年,“老鼎丰”从原来的酱园弄搬到了城关镇南门大桥,厂房从木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,引进了新设备,车间里局部开始机械化操作。姜炜也从一名普通工人,变成了车间主任。“1981年以后,我们车间里拌料就开始用机器了,省了不少人力。产量也翻了近一番。”

1993对于“老鼎丰”和姜炜,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。

这一年国有企业迎来了“改制”热潮。当时的“老鼎丰”处于亏损状态。原来的厂长是外派来酿造厂的,对于酿造技艺并不熟悉,想改革也有心无力。于是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让“老鼎丰”进行改革,由厂里员工民主投票选出厂长。姜炜就此被推上了前线,挑起了企业的重担。

抵制欧盟CR法案的黄发静——

## 背靠大树闯世界

记者 徐齐

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大厅里,挂满了黄发静与国内外交商界名人的合影。近些年,温州打火机行业不少企业纷纷关停或转行,从五百多家锐减至近百家。黄发静依然坚守“阵营”,“打火机产业曾是温州四大支柱产业之一,消失了太可惜。”他说。

上世纪90年代,打火机产业在温州风靡。辞职下海的黄发静看到商机,成了打火机“阵营”中的一员。当时温州有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2000多家,却大都仿制日本打火机的款式,市场上大量产品雷同,质量低劣。

“现在很多人说,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‘无为而治’。事实并非如此,打火机产业的蓬勃恰恰得益于政府的‘有为’。”黄发静说。1992年,在温州市政府的授意下,鹿城区成立了打火机行业整顿办公室,这直接促使了温州打火机产业“质的转变”。那几年,黄发静也迎来了企业的黄金成长期。

好景不长。1994年,美国首先对打火机生产销售实行CR法案,要求对海关价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安装儿童保护装置。由于温州打火机的离岸价基本都在2美元以下,70%的温州打火机产品被逐出了美国市场。这让黄发静和同行们受到了不少冲击。

“我的市场大部分在欧洲,CR法案如果通过,几乎就意味企业的末日。”这时,黄发静做了一件人生中令他骄傲的一件大事。当年12月,他携同伴同仁,以企业名义召开了“抵制欧盟CR法案研讨会”,请来中央至地方的各大媒体。经过一轮媒体热议,事件进入中央视野。当时正值中国加入WTO前



1981年迁入的老鼎丰南门大桥旧址。(资料照片)

当时,平湖市场上已经有不少外地调味品进驻。“我当时已经在‘老鼎丰’呆了快20年了,眼睁睁看着其他牌子摆上商场里的货架,心里火急火燎的,想着‘老鼎丰’也要走出去,才能活下来。”姜炜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为“老鼎丰”开拓销售市场。他带着“老鼎丰”产的酱油和米醋,辗转在各个批发市场,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。

市场开放后,“老鼎丰”这块百年老字号招牌,吸引了上海、杭州一些知名调味品企业上门合作。这让姜炜又喜又忧。喜的是产品销路有了保证;忧的是替人生产,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“老蔡、陶大……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过。那时候我看到货架上摆着的是自己的牌子,心里是说说不出的难过。”姜炜决定调整发展思路,让“老字号”重现新气象。

2005年,企业从中心城区南门大桥搬迁到了经济开发区。姜炜带着厂里的员工打造自己的商标“群欢”。经过连续几年的调整,现在“老鼎丰”出去的每一瓶酱油和米醋,都贴着自己的牌子。“群欢”已经逐步走出了嘉兴,走出了浙江。

这家1914年就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的百年老字号酱园,虽然几经波折,可到今天还活跃在市场上。姜炜不满足于让老字号“活着”,而是要让老字号活得富有生命力。“春准备,夏造酱,秋翻晒,冬成酱”,姜炜又念起了这几句烂熟于心的顺口溜,“这一念已经好几十年了,忘不了!”



欧洲打火机进口协会会长邱博先生(左)访问日丰公司。 黄发静 供图

夕,国家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刚刚成立。“温州打火机企业抵制欧盟CR法案”,成了该局第一笔公务。经过种种抗争和努力,2003年12月9日,欧盟宣布CR法案暂不生效。那一年,黄发静因此获得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。颁奖词黄发静记得非常清楚:“他以民间的力量,推动着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”。

然而,市场风云变幻。2006年以来,不断的贸易纠纷、韩国和日本也先后出台CR法案,美国启动“337调查”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加上企业成本逐年增加,温州打火机行业发展艰难。

但黄发静不打算放弃。近几年来,黄发静携研发团队开发了野外多功能点火枪、无气体点烟器等系列新产品,改进了包装和设计,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,并在欧美等国设立了售后服务网点。一系列应对举措让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生存了下来。

“最近,我们还在和美国ZIPPO公司洽谈合作,有望为温州建设时尚之都做点实事。”黄发静说,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,都要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,拿出温州企业家敢闯敢拼、不服输的精神,练好内功、做好准备,等待机遇的再次光临。